

抗战时期的香港救亡团体述略

赵 佳 佳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抗战期间,香港作为自由港曾一度远离战火,后被日军占领直至二战结束。香港沦陷前,香港华人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感召下以结社的形式援助祖国抗战,在抗战宣传、物资筹募、难民救济、回内陆服务等多方面做出重要贡献。香港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港九广大农村地区成立了许多以农民为主体的抗日团体。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香港救亡团体主要以后援方式向内地提供援助,至香港沦陷期间,转变为直接参与军事抵抗等抗日活动。

关键词:抗战;香港;团体;救亡

中图分类号:K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6-0042-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605

香港在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抗战物资重要转运地,在港爱国同胞还通过组建各类救亡团体参与抗战救亡,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关于香港救亡团体的研究成果非常少,仅见邓家宙对1935年至1941年香港救亡团体数量、成立时间的考证^[1]以及周耀华对香港学生赈济会的研究^[2]。这使我们难以全面认识抗战时期香港民众的救亡活动。那么,抗战期间香港救亡团体的总体面貌究竟如何?它们对祖国抗战的贡献有哪些?香港沦陷后是否还有救亡团体存在?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一、与国一体:全面抗战初期香港救亡团体的勃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步伐,不断挑起事端,终于在1937年7月7日阴谋策划芦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作为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自由港,香港直到1941年年末被日军攻陷之前,因其毗邻内地往来便利又远离战火的缘故吸引了大批难民纷纷涌入。祖国危难近在眼前,无数难民来港避难,目睹这一切的香港同胞感同身受,他们和各地来港华人共同掀起轰轰烈烈的民族主义高潮,成立各种救亡团体抗战报国。

较早出现的救亡团体是1935年12月成立的香港抗日救国会,这是一批受“一二·九”运动影响的香港进步青年成立的借文化活动进行抗日宣传的组织,参加者有学生和工人团体,“共约二百人左右,

收稿日期:2020-06-19

作者简介:赵佳佳(1987—)男,河南修武人,法学博士,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华南抗战史。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重大贡献研究”(15BDJ042)。

后来扩大,人数最多时约有二千人”^{[3]158}。次年,绥远抗战爆发,香港同胞的爱国激情进一步增长,海员洋务工人发起了援绥运动,“由‘余闲乐社’发起,联合了三十六个团体共同组织了香港海员、洋务工人筹赈绥远兵灾联合会”^{[4]76},并召开群众大会,定期出版刊物,公开宣传全国人民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港侨赈济绥远难民会、香港各界救国联合会、华人机器会十科工商同业筹赈会等救亡团体也先后成立,为祖国输送了一批宝贵的抗战物资。这些团体的成立与内地发生的重大事件息息相关,参与者包括工人、学生、商人等群体,表明香港救亡团体自兴起之日时就是一次覆盖阶层广泛的统一战线行动,已经初步显示出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团体的一些基本特点,如应时性、群众性等。

日寇全面侵华使香港各界群情激奋,怒涛滚滚,自发的反日罢工、抗战宣传以及动员人力物力的筹募工作非常积极。一时之间,香港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虽然由于港英政府的限制性政策,抗日旗帜无法公开,以至于当时许多报纸只能“开天窗”——抹去抗日字样留下空白之处,但英日之间的矛盾使“英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采取半只眼开半只眼闭的态度,对于有捐款赈灾等名义下进行的抗日运动是容许的”^{[5]341}。在此情况下,香港民众纷纷以“赈难”“救济”为名,成立各种救亡团体,1937年7月到9月成立的22家救亡团体中就有17家直接以“赈济”“赈灾”“筹赈”“援赈”“救济”“救护”等为名。如当年7月成立的香港电影界赈灾会、海外各属华侨品位筹赈会,8月成立的华人赈灾会、中国妇女兵灾筹赈会等,9月成立的海员洋务援赈战区伤难同胞联合会、香港学生赈济会、广东中华救护队香港办事处等。据公开统计资料,“七七”事变后到1940年末成立的香港救亡团体不下60个,绝大部分以“赈难”为名(见表1)。香港救亡团体在短时间内集中成立标志着香港华人民族意识的集体觉醒,是香港爱国人士在抗战救国旗帜下精诚合作、携手抗敌的时代象征,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战区外形成和发展的光辉典范,同时形成了香港结社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

表1 1937—1941年的香港抗日救亡团体

以“赈难”“救济”等为名的团体	其他名称的团体
(1)香港电影界赈灾会,(2)海外各属华侨品物筹赈会,(3)华人赈灾会,(4)侨港中国妇女兵灾筹赈会,(5)中华医学会救伤赈灾会,(6)新界民众筹赈兵灾难民会,(7)香港九龙各社团赈灾联合会,(8)华商总会筹赈会,(9)海员洋务援赈战区伤难同胞联合会,(10)公教进行社筹赈会,(11)香港学生赈济会,(12)香港糖商总会筹赈兵灾委员会,(13)香港煤炭业工商联合总会筹赈会,(14)全港小足球赈灾会,(15)广东中华救护队驻港办事处,(16)潮州同乡会灾区服务团,(17)港大学生会中华医药救济会,(18)香港九龙学界筹赈兵灾会,(19)中国港侨救护团全港各界赈济华南难民会,(20)香港青年赈灾服务团,(21)香港中国绸缎行商赈济兵灾会,(22)全港各界赈济华南难民会,(23)旅港福建商会救济难民委员会,(24)九龙仓全体华人筹赈会,(25)旅港潮侨筹赈兵灾筹难民会,(26)香港商务专门学校长期赈济会,(27)香港紧急救济难民会,(28)新会商会救济桑梓会,(29)烧腊行工商筹赈会,(30)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31)中国青年筹赈会,(32)英国筹赈中国难民香港分会,(33)南洋惠侨救乡会,(34)香港救济学生委员会,(35)粤侨救济桑梓会,(36)华南难民工业社,(37)香港安南米庄救济难民联合会,(38)雪兰义广东救济难民委员会,(39)粤港基督教国难筹赈会,(40)中山第四区旅港同乡筹赈会,(41)广东省救济委员会香港分会,(42)港澳赈济会,(43)中国青年救护团,(44)香港华人公务员救护队,(45)崇正总会救济难民委员会	(1)中国妇女慰劳会香港分会,(2)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香港分会,(3)香港华人小学零用贮捐会,(4)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香港办事处,(5)香港惠阳青年会,(6)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7)保卫中国同盟,(8)香港民族革命通讯社,(9)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10)全国文协理事会香港通讯处,(11)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12)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13)旅港鹤山商会服务团,(14)海外华侨回国服务团,(15)节约建国储蓄运动香港分会,(16)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

说明:以上信息根据《大公报》(香港版)和邓家宙《抗战时期香港救亡赈难团体(1935—1941)介绍》(《抗战文化研究》第十一辑)等资料整理而成。

二、捐输助战：香港沦陷前救亡团体的贡献

日寇侵华点燃了香港爱国儿女的抗战激情,他们虽处异邦治下却心系祖国,通过成立或参与各种救亡团体,凝聚起抗战的香港力量,在抗战宣传、物款募集、难民救助、战地服务等各项行动表现出强大的组织动员力和坚定的抗战报国心。

(一) 抗战宣传

抗战宣传是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抗战,提高民众抗战觉悟,坚定民众抗战意志以及争取国际援助的重要方法。香港救亡团体利用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不仅在香港和广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抗战宣传,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热情,有效提高了香港和广东地区民众的抗战觉悟,而且对于传播中国抗战声音,扩大中国抗战影响,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战时的香港文化界是抗战宣传的主力军之一。随着战事扩大,来港文化界人士日益增多,使香港一时成为文化热土,抗战宣传活动发展迅速。当时,香港文化界主要从事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发起香港文化界的统一战线运动。香港素称文化沙漠,且“一盘散沙毫无联系”^{[6]366},“艺协”在1937年10月31日发起香港文化界座谈会,完成了香港文化界的初步统一,包括教育界、新闻界、电影界和写作者等。二是推动抗日戏剧运动。戏剧宣传是最能号召和教育广大民众的方式,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爱国青年纷纷成立各种抗战救亡戏剧团体,当时全港约有戏剧团体200个,演出剧目超过300个^{[7]81},影响较大的戏剧团体有七七、丁丑、红白、培训、时代等剧社,常演剧目有《东北之家》《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最后一计》《林中口哨》《血海晴空》《春风秋雨》《魔窟》《凤凰城》《上海屋檐下》等。这些业余和专业剧团不仅在本地演出,也在澳门和内地各处进行巡演,他们的戏剧演出活动在宣传抗战、组织民众参与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除了各类戏剧团体,其他救亡团体也经常通过演出进行抗战宣传,东江回乡服务团在各县演出150次以上,每次平均观众800人^{[8]191}。

各类救亡团体进行抗战宣传的形式和方法丰富多样,具体地看,一是开办各种识字班,进行文化宣传,包括建立民众夜校、文化站、书报室等;二是张贴散发各类文图材料,包括写标语、画漫画、发传单等,东江回乡服务团“双十”纪念各队发出宣言约一千五百份^{[8]191},香港学生赈济会如遇“不能发表什么宣言,就用告同学书的办法来代表”^{[5]162};三是举办各类会议活动,如召开群众大会、节日纪念会、战时报告会等,全东江民众共两万人以上参与各种动员会^{[8]191};四是创办抗战报刊,如东江回乡服务团发行的《东江》周刊、东江流动剧团创办的《奔流》杂志,香港学生赈济会创办的《学生呼声》会刊等;五是口头宣传,“这是最能接近群众深入群众的方法,差不多普遍的为每个同志运用着……街头演讲,访问,个别谈话,经常给同志们采用着”^{[8]191}。

除了在内陆和香港本地进行宣传,香港救亡团体还非常注意面向国际,宣传中国抗战故事、传播中国抗战声音,争取国际援助。在这方面,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作出了重大贡献。“保卫中国同盟”的机关刊物《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是“保盟”进行对外宣传的主要平台,从1939年4月1日正式出版到1941年11月香港沦陷共出版36期。《通讯》分为中文版和英文版,中文版面向海外华侨社团,英文版面向国外有关机构和“保盟”海外支部。“保盟”通讯不仅对国统区的抗战进行客观报道,还有相当多的篇幅对在极其艰苦条件下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报道,为推动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庆龄曾说:“对于世界上真正想要了解中国斗争的人们来说,这些出版物做了一定的贡献。”^{[9]377}

(二) 物款筹募

物资不足是中国军民在抗战中始终面临的困境,这受到了香港救亡团体的高度关注,全面抗战爆发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救亡团体从事的最主要工作就是筹募抗战物款。因为“香港的工商贸易比

较发达且距抗战前线较远,组织抗日募捐活动既能为香港民众接受,又能激发香港民众热情有效支援抗战”^{[7]111}。“七七”事变后成立的60余家救亡团体中,绝大部分救亡团体都以物款募集为主要任务,如香港学生赈济会始终把抗战物款募集作为工作重点之一。这些救亡团体为中国抗战募集了大量物资,仅“保卫中国同盟”从1938年6月成立到1941年11月在香港的3年半时间内,就募集现款如下:国币810 879.93元,港币185 640.11元,美元5 443 765元,英镑3 417.89元,加拿大币3 059.15元,外加1 032.32比索、38.75西班牙比塞塔和7荷兰盾,以及大量的物资^{[10]412}。香港学生赈济会、香港中国妇女兵灾筹赈会、中国妇女慰劳会香港分会等团体的表现也非常突出。

具体地看,香港救亡团体开展筹募的对象各有侧重,方式和途径略有区别,物资筹募的规模也有不同。一些救亡团体的筹募活动主要针对个别阶层和对象,如中国妇女慰劳会香港分会成立后,于1937年8月26日通过招待会的形式进行募捐,席间共得款12万余元^{[11]273},《探海灯日报》称其“捐款成绩高于一切”^{[11]272},该会募捐效果突出与此次募捐对象主要是各界名流及其眷属有直接关系。但并非所有团体都能通过社会名流进行募捐,大部分救亡团体扎根民间,以普通民众为募捐对象,成绩依然不菲,如华人赈灾会曾一连六日沿门劝捐共获4万余元^{[11]273}。

在筹募过程中,许多救亡团体采用双向并举方针,既通过类似会员制的形式发动会员捐款捐物,也公开向社会募集。如中华医学会香港分会决定会员每月捐款一次,以作长期赈济^{[11]271}。香港中国妇女兵灾筹赈会募集经费的来源有三种,基本金、月捐和向各界募捐,其中基本金及月捐由会员及侨港名流眷属赞助^{[11]273}。向社会公开募捐是各类救亡团体筹集资金的最主要形式,可以使募捐效果和规模最大。具体地看,一是义演,香港学赈会曾邀请名演员马师曾、吴楚帆、紫罗兰等参加义演,“保盟”曾邀请舞蹈家戴爱莲以及著名影片《裘莱士》参与义演筹款。二是义卖,义卖主要是向厂商、社会名流等各界征集各类衣物、字画和其他日用品集中售卖筹款,义演义卖的意义重点不在于筹得款物的多少,而在于它们每一次的举行都是一次进行抗战宣传的良机。三是献金运动,1938年8月,香港多个团体联合举办“八一三”献金运动,由全港各界赈济华南难民联合会督办,原定4天的献金活动因为香港同胞踊跃参与而延长至10天,这是一次极为全面广泛的抗战爱国动员,连一向被当时人们视为“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歌女也积极参与。据统计,香港“八一三”献金运动共筹集到100多万元^[12]。除此之外,推销救国公债、纪念日卖花以及组织游艺活动等也是香港救亡团体常用的募款方式。

救亡团体不仅注重长期性募捐活动,还因应战时需要募捐相应的急用物资,如香港中国妇女兵灾筹赈会因为上海战事紧迫,一周内赶制各种药棉、绷带、衣物和救伤药品共十二大麻包,其中士兵自用救伤物品2 000件,伤病衣服200余套,绷带1 700余扎,三角扎伤带400件,被单枕袋80件^{[12]272}。1939年4月,“保盟”接到新四军需要单人蚊帐和奎宁等药品的求助信,很快募集了6 000顶蚊帐、20万片奎宁、12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和2 000个消毒包^{[10]179},缓解了新四军一时的医疗困难。

(三)难民救济

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曾经历过两次难民潮。第一次是淞沪会战前后,难民主要来自上海、南京等华东地区;第二次是广州沦陷前后,难民主要来自广东地区。两次难民潮使香港人口激增,据统计,到1941年,香港总人口已经达到164万,几乎是1931年的两倍^[13]。来港难民中除一部分工商界和文化界人士外,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他们的生活根本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幸运者投亲靠友或租住房屋以求一席之地,但也是拥挤不堪,平时每层居住20人的三层华式楼房此时每层要住60人^{[14]62},不幸者只能露宿荒郊,任风吹雨打。1938年夏,港九地区共有3万人流落街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来港难民^{[14]62}。

为救济难民,香港救亡付出了巨大努力。这其中既有像东华三院、崇正总会这样的传统慈善组织或社会团体,也有全面抗战爆发后成立的爱国团体,如学生赈济会、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保卫中国同盟等,还有海外友好组织如英国筹赈中国难民香港分会。可以说,这是一次香港的全民行动,是香港救助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辉行动。

东华三院始创于1870年,是香港地区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华人慈善组织,抗战期间为救济难民出力甚多,甚至为难民问题困扰的港英政府也寻求东华三院的协助,仅从1938年初到5月份,东华三院就为2648名内地难民提供食宿^[15]。除了为难民提供住宿,东华三院也积极帮助难民回乡,到1940年,共资助难民6073人^{[16]93}。香港崇正总会在粉岭设设施赈处,每日办理施米工作,前来领米难民不下数万;据记载,第一周有一万余人,第二周增至二万余人,不久又增至三万余人^{[17]148}。由此可见,香港当时的难民状况极为堪忧。英国筹赈中国难民香港分会的救济难民工作成果显著,到1939年1月初,共募集捐款4万余元^[18]。

香港救亡团体不仅对流落香港的难民伸出援助之手,还直接深入内地或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内地难民渡过难关。香港惠阳商会专门拨款4000元并派人到博罗等地从事救济工作,中华慈善救护会捐献棉衣140件并通过该商会前往赈济^[19]。香港鹤山商会专门派员到鹤山施赈,共计大米600包,并带回难童100名交由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收容^[20]。为救助受黄河水灾影响的西北灾民,1941年5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得到华商会等团体的大力支持,到当年9月1日,“一碗饭运动”共计筹款港币22144.95元、国币615元^{[10]399}。

由于来港难民中有大批儿童,各战区也在不断产生新的难童,保护难童的生命安全并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对之教养就成为当务之急,各救亡团体为此出谋划策、殚精竭虑,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通过各种方式为难童募捐,如1939年3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联合香港学生赈济会发起新年儿童献红包救济难童运动,3天共筹得1200余元^[21],在此之后还邀请梅兰芳参与义演^[22]。与此同时,保育会也尽最大可能创办难童学校,对难童进行教育,先后在元朗、九龙设立保育院3所^[23]。1940年初,由爱国华侨胡文虎、胡文豹捐赠的九龙新界粉岭保育院新舍落成,于是在香港的3所保育院合并为香港儿童保育院^{[24]158}。

香港救亡团体积极行动、主动帮助各地辗转来港的难民,使飘零异乡、饱尝转徙之苦的内地民众感受到了浓烈的同胞情谊,也显示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

(四) 返内服务

香港救亡团体不仅紧锣密鼓地在本港开展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也组织和派出多个服务团内返参与各项斗争,在抗战宣传、战场救护、施医赠药等方面不遗余力,有些人还直接参与到对日武装斗争中,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七七”事变后,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和海陆丰同乡会等团体已经组织并派出回乡救亡工作团,到惠阳、宝安、海陆丰等地从事宣传和组织民众、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等抗日救亡工作^{[8]5}。

1938年10月广州失守后,“直接支持与援助广东内地的武装抗日斗争……成为香港各个群众团体工作的中心内容了。而这些工作中的中心工作是:动员群众,回国参战”^{[5]348}。当时参加动员工作的团体主要有:学生赈济会、惠阳青年会、东江华侨救乡总会驻港办事处、琼崖同乡会、恩平同乡会、余闲乐社、海陆丰同乡会等,其中,尤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和香港学生赈济会为杰出代表。“动员工作对于开展东江的武装工作及地方工作是有决定意义的”^{[5]349}。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成立于1939年1月,由南洋惠侨救乡会和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和海陆丰同乡会等团体合并而成,标志着南洋和香港两地的抗战救亡运动的汇流。它的宗旨是“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并拯救伤兵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8]54}。“东团”成立后,立即奔赴灾区进行救济难民和宣传抗战,同时还积极从事民众动员和组织工作,建立青年读书会、青年抗敌同志会、抗敌妇女会、乡村自卫协会、抗敌儿童团等组织,如李翼领导的第三团在长宁、澜石两个乡组织了有100多人参加的抗日自卫队,潘祖岳等领导的增龙队先后组织三个抗日杀敌中队,每队50到100人^{[8]12}。除此之外,为培养民众运动的骨干,“东团”还组织各种类型的训练班,培训团员达三、四百人次,“对推动东江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8]13}。

日军进犯广东后,学赈会积极组织香港青年回内地服务,当时学赈会采取正确的动员方针,动员对象主要针对失学失业青年和沦陷区的来港知识青年,在校学生则主要从财力上进行帮助。学赈会一共五个回乡服务团,共 242 人,其成员构成见表 2。他们在广东从事的主要工作包括抗战宣传,动员民众参与救亡运动;救灾赈济,向贫困农民施医赠药;在战区抢救难民和伤兵,以及帮助抗日武装培训干部等。

表 2 香港学生赈济会动员青年回内地情况一览表

名称	总人数	党员	男	女	学生	工人	去向
第一团	34	14	30	4	31	3	到南路张炎处
第二团	26	0	22	4	26	0	到西江工作
第三团	30	4	30	0	30	0	参加战时训练班
第四团	24	0	20	4	24	0	到汕头随军工作
女工作团	7	4	0	7	7	0	到惠阳工作
个别的	20	8					到惠阳游击队
一批的	100	5					到南路学生军

三、直接抗日:香港沦陷后救亡团体的转型

1941 年 12 月 25 日,在抵抗了 18 天之后,香港总督杨慕琦投降,日军占领香港。此后,日军以屠杀为始,对香港进行残酷统治,驱赶移民,致使香港人口急剧减少,经济大为萎缩。到抗战结束时,香港人口仅剩 60 万,高压的监控政策、严酷的斗争形势,萎缩的贸易往来、困顿的经济生活,导致全面抗战初期那种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不复再现。但是,香港同胞的抗日斗争并未在日军的高压政策下消失,一部分先前参与救亡团体的先进分子加入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游击战争中,开始直接对日作战,如香港学生赈济会女学团的一部分女学生“投入东江纵队或其他战区坚持抗战;一部分如陈佩雯、黄炜英、黄琦珊等留港坚持城市游击战”^{[11]31},学赈会儿童团团长方兰,在日占时期是港九大队市区中队指导员等。

尽管像香港沦陷前那种公开活动的救亡团体难以再组织起来,但是抗日游击队在广大农村地区通过广泛宣传抗战、维护群众利益、保护群众生命安全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抗日激情,提高了农民群众对抗日救国的认识。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港九大队是香港沦陷期间唯一在香港坚持武装抗日的队伍,“经过发动和精心组织,各村各乡的抗日团体如青年会(团)、妇女会、儿童团、抗青队、生产自救队等有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发展起来”^{[11]100}。香港救亡团体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和低迷后,重新以新的面貌和组织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组织更严密、斗争更坚决,活动中心从城市地区转到农村地区,斗争方式也从主要以捐输赈难的名义间接援助祖国抗战转变为共产党领导下在香港本地直接参与对日斗争。

这些抗日团体是保护群众和部队安全的重要防线,港九大队能在日军严酷统治下的香港发展壮大与这些抗日团体的隐蔽和保护分不开,同时,这些抗日团体也是港九大队的后备力量,后来参与港九大队的战士全部来自青年会、民兵队等,港九大队西贡中队的中队长张兴此前就是西贡区大浪村青年会的会长。总体而言,这些抗日团体在搜集传递情报,为港九大队运送抗战物资,做好港九大队后勤保障以及宣传抗战等方面贡献了重要力量,如当时运送物资的重任往往由各村妇女会承担;1944 年日寇为搜捕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对西贡区进行大扫荡,西贡区游击小组和“游击之友”等群众情报组织成员深入敌人据点刺探敌情,对粉碎敌人扫荡阴谋起了一定作用。

四、结语

纵观抗战期间香港救亡团体的发展历程,“九一八”事变引发的香港华人民族意识的高涨终于在“七七”事变后形成怒涛。香港华人与国同体,和内地来港民众自觉自发地凝聚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以救亡团体的形式贡献爱国力量和报国热忱,这些救亡团体为华南地区乃至全民族的持久抗战贡献了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也在香港结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很快被日军占领,沉沦在黑暗中长达三年零八个月之久,由于日军的高压政策,救亡团体失去了生存空间,很多无形消亡,但曾经参与救亡团体的一些进步分子或回内地参与斗争,或在香港坚持游击战争。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地区兴起了大批以农民为主体的抗日团体,并直接参与到对日斗争中。总体来看,香港救亡团体经历了一个从平静到勃兴又到沉寂,并进而转移阵地再次活跃的过程,香港的抗战救亡运动也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主要以后援方式向内地提供援助,转变为香港沦陷时期直接参与军事抵抗等抗日活动。

[参 考 文 献]

- [1] 邓家宙. 抗战时期香港救亡赈难团体(1935-1941)介绍[J]. 抗战文化研究(第十一辑), 2018.
- [2] 周耀华. 抗战初期(1937-1940)香港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研究——以香港“学赈会”为考察中心[D]. 广州: 广东省委党校, 2017.
- [3]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36辑[G].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2.
- [4] 曾生. 曾生回忆[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2.
- [5] 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中共香港市委文件(1938-1941)[A]//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1987.
- [6] 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44)[A]. 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1987.
- [7]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港澳同胞与祖国抗日战争[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5.
- [8]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广东港澳华侨同胞回乡服务团史料[G]. 内部出版, 1985.
- [9] 宋庆龄. 宋庆龄选集: 下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 [10] 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M].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9.
- [11] 广东省妇女联合会, 广东省档案馆编.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A]. 广东省档案馆, 1991.
- [12] 彭建新. 抗日救国 慷慨解囊——1938年港澳同胞“八一三”献金运动[J]. 党史文汇, 2013(11).
- [13] 丛德奇. 香港的人口增长[J]. 人口学刊, 1981(3).
- [14] 香港政府行政报告(1938年)[R]. 1938.
- [15] 张丽.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J]. 抗日战争研究, 1994(4).
- [16] 香港东华三院董事局编. 香港东华三院百年史略[M]. 香港: 香港东华三院, 1970.
- [17] 香港崇正总会. 香港崇正总会救济难民会特刊[M]. 香港: 香港崇正总会, 1940.
- [18] 本港简讯[N]. 大公报(香港版), 1939-01-05.
- [19] 惠阳商会 救济桑梓[N]. 大公报(香港版), 1939-03-06.
- [20] 鹤侨代表 返乡施赈[N]. 大公报(香港版), 1939-04-28.
- [21] 献红包 共筹得千余元[N]. 大公报(香港版), 1939-03-04.
- [22] 梅将再度义演 为难童请命[N]. 大公报(香港版), 1939-03-12.
- [23] 保育会三院 将建新址[N]. 大公报(香港版), 1939-02-14.
- [24] 任真主编. 我们在抗日烽火中成长[G]//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 战时儿童保育会北京会

友联谊会,1988.

On Hong Kong Salvation Organizations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Zhao Jiajia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Hong Kong, as a free port, was once far away from the war, and then occupied by Japan until the end of Second World War. Before the fall of Hong Kong, the Chinese in Hong Kong, inspired by the spirit of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helped the motherland in the form of association,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the propaganda of the war, material collection, refugee relief, return service, etc. After the fall of Hong Kong,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ny anti-Japanese organizations with farmers as the main body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vast rural areas of Hong Kong and Kowloo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Hong Kong's salvation organizations changed from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China in the form of post aid to directly participating in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such as military resista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Hong Kong's occupation.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 Hong Kong; organization; salvation

[责任编辑:左福生]